

# 論東歐國家與中共關係之演變

洪茂雄

## 一、前言

趙紫陽以中共國務院「總理」和中央代理總書記雙重身份，於六月三日啓程前往波蘭、東德、捷克、匈牙利和保加利亞等五個東歐共黨國家正式進行訪問。這是中共自五十年代以來第一位以黨、政首長雙重身份訪問上述東歐國家的高級官員。①因此，趙紫陽此次東歐之行特別引起外界矚目。

一九四九年中共竊據中國大陸時，東歐共黨國家均立即追隨蘇聯承認北平偽政權，惟自赫魯雪夫(Nikita Chruschtschow, 1894-1971)接掌蘇共領導權之後，中共與東歐國家之間的關係隨即引起了戲劇性的變化：五十年代由「友好合作」逐漸疏離；至六十年代，則因中蘇共意識形態鬭爭尖銳化，而呈現關係緊張；其後，黨與黨之間的關係決裂，政府間的關係僅維持最低水平，鮮少有正式的官方交往。中共與東歐國家(南斯拉夫、羅馬尼亞、阿爾巴尼亞等三國不包括在內)這種冰凍關係幾乎持續了四分之一世紀之久。直到一九八三年，中共與這些東歐國家副部長級的高級官員開始互訪，彼此間的關係始有明顯地改善。

去(一九八六)年九月，波蘭統一工人黨(即波共本名)中央第一書記兼國務委員會主席(即國家元首)雅魯澤爾斯基(Wojciech Jaruzelski)率先訪問中國大陸。這是親蘇的東歐集團三十年來第一位訪問北平的共黨領導人。同年十月，東德統一社會黨(即東德共黨本名)總書記兼國務委員會主席何內克(Erich Honecker)，也緊跟波共領導人之後抵達中國大陸訪問。今年四月和五月，捷克部長會議主席什特勞加爾(Lubomir Strougal)和保加利亞共黨總書記兼國務委員會主席日夫可夫(Todor Schiwkoff)亦先後到訪。由此以觀，中共與上述東歐共黨國家關係二十多年的冰封狀態業已解凍，黨際關係終於恢復。

註① 一九五七年周恩來會以國務院「總理」身份訪問過波蘭，一九七八年華國鋒則以中共黨主席兼國務院「總理」身分訪問過羅馬尼亞和南斯拉夫。

本文的主旨有二：其一，試就中共與東歐國家關係之演變，藉以瞭解當前共黨國家所存在的問題與彼此間可能之發展；其二，認識中共與共黨國家間關係的發展有助於瞭解中共搞「改革」和「開放」的動向。此外，我國政府已開放東歐市場，這些年來貿易額略有增長。<sup>②</sup>因此，中共與東歐國家關係之發展，亦當值得國人注意。

## 二、東歐共黨國家之共同特性

東歐共黨國家均自稱「社會主義國家」，並以所謂的「社會主義建設」為其立國之本。按照馬克思 (Karl Marx 1818-1883) 的說法，「社會主義社會」是「共產主義社會」的過渡階段。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區別在於「社會主義是從資本主義中成長出來的新社會的第一階段；共產主義是這個社會更高級的、更進步的階段。」<sup>③</sup>因此，所有共黨政權均強調「建設社會主義」，其建設社會主義的目標則是要過渡到共產主義。事實上，共黨政權所主張的「建設社會主義」任務，使共產黨有理由控制政權，支配資源，以最快速度達到工業化，俾帶動其他有關的社會發展過程：諸如都市化、勞動、教育訓練、政治等發展。為此，這些東歐社會主義國家都離不開這種意識形態的窠臼，「現代化」為首要政治任務，同時，現代化也是建設共產主義的先決條件。<sup>④</sup>綜觀戰後四十年來的發展，東歐共黨國家大體上具備了下列三點共同特性：

(一) 共產黨一黨專政，是社會中絕對的主導力量。東歐國家除波蘭外，最近十多年來，共黨黨員人數以及其在總人口中的比例皆有增加，但幅度不大。最多者為羅馬尼亞，共黨黨員佔全國人口總數的百分之五點三；最少者為阿爾巴尼亞，黨員人數佔全國人口的百分之四點一。<sup>⑤</sup>在阿爾巴尼亞、匈牙利、羅馬尼亞及南斯拉夫，共產黨是唯一的政黨；保加利亞、東德、波蘭與捷克是多黨國家。不過，不論是一黨或多黨國家，共產黨在政治上的統治權是絕對的。共產黨的領導人就是全國政治的領袖，政府中的重要職務皆由高級共黨黨員出任。

(二) 政府組織形式和結構大致雷同。東歐各國的行政、立法機關名稱上或許不盡相同，然其形式和結構殊多相似。其國民議會（或稱人民議院）選出國務委員會或主席團成員，以及部長會議成員；後者是最高行政機關，前者是國民議會的常設機關。主席

註② 一九八六年我國與東歐國家（包括蘇聯）貿易額共一億兩千六百萬美元。見：中國時報，民國七十六年三月一日，第二版。

註③ 列寧文選，第二卷，北京，一九五四年，頁五九一。

註④ 畢英賢等，東歐國情分析與我國外交政策，臺北，行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民國七十五年，頁二。

註⑤ 同註④，頁三。

團主席或國務委員會主席是國家的元首；部長會議主席即是最高行政首長，即一般通稱的總理。

(三)社會結構相近。東歐社會主義國家已消除階級區分，把人民通常分為兩大類，即：工人與農民，以及由這兩個階層中脫穎而出的知識分子階層。在東歐各國社會中，各個領域或各類職業勞動者並非按平均主義原則領取報酬，而是按個人的才能與工作性質獲得酬勞。在這方面，東歐各國的主要勞動分類是：技術的與非技術的、努力的與非努力的、男人與婦女。<sup>⑥</sup>

東歐共黨國家的出現，是蘇聯擴張主義政策的結果。為此，東歐這八個社會主義國家均以蘇聯模式為藍本，其社會、政治、經濟等典章制度皆抄襲蘇聯樣板。蘇聯模式的特點是：社會主義工業化、農業集體化、生產資料公有、以及有計劃按比例發展國民經濟。經濟決策權集中於政治領導階層，經濟管理權則似金字塔式的層層節制，把資源強制地集中於經濟發展的重點部門。這類措施的目的與功能在使經濟於短期內快速成長，並藉着重工業與原料工業為主的工業化使經濟結構迅速轉變。這一制度在實施之初，尚能收效一時，但行之未久，即已百弊叢生。因此，近二十多年來，東歐共黨國家以及其他共黨政權皆不斷實施經濟改革，以圖自存。<sup>⑦</sup>

東歐國家儘管離不開蘇聯模式的窠臼，但歷經四十年國際間的互動關係也起了一些變化。目前，就其政治發展和對外政策而言，東歐這八個共黨國家，至少可區分三種不同的類型：

- 第一，是採取獨立自主的，如羅馬尼亞和南斯拉夫；
- 第二，是與莫斯科步調一致的，如波蘭、東德、捷克、保加利亞和匈牙利；
- 第三，是堅持史達林主義路線的，如阿爾巴尼亞。

第一種類型，羅馬尼亞雖然是華沙公約和「經互會」(COMECON)成員，但在東歐却有「獨行者」之名，不許蘇軍駐紮該國，拒與華約軍隊舉行聯合演習(只參加參謀人員的圖上作業)。<sup>⑧</sup>南斯拉夫於一九四八年即脫離蘇聯集團，五十年代後期，與印度、埃及帶頭倡導不結盟運動，在東歐的「經濟互助委員會」僅以觀察員的身份參與。羅、南兩國與西方國家都有密切的來往。第二種類型，除了保加利亞之外，其餘均一度內部呈現不穩，如東德一九五三年之工潮和一九六二年的柏林圍牆事件；波蘭、匈牙利於一九五六年掀起的自由化運動；捷克一九六八年的「布拉格之春」以及八十年代初期波蘭的團結工會事件，經過莫斯科的血腥鎮壓或威脅利誘，始告平息。由於有了這些慘痛的教訓，克里姆林宮對這些國家的領導人特別注意，不容他們有所偏離

註⑥ David Lane, *The Socialist Industrial State* (London: George Allen & Unwin, 1979), p.178.

註⑦ 同註⑥，頁三。

註⑧ *Ostevropa*, 7/1982, p. 588-600.

。一九八四年東、西德一度出現「蜜月對話」，東德共黨總書記何內克曾公開表示接受西德政府的邀請，正準備前往西德訪問，却遭到莫斯科嚴重的警告而放棄。至於第三種類型，阿爾巴尼亞以一個蕞爾小國（面積只有二萬八千餘平方公里，人口二百八十四萬人）先後與蘇共和中共交惡，在東歐扮演獨腳戲，鮮少與他國交往，只因爲阿國地處巴爾幹半島上，在戰略上尚具有某種程度的作用，才使得中蘇共有意與地拉那（Tirana）修好的意願。

### 三、中共與東歐國家關係之演變

基本上，中共與東歐國家之間關係的改善，也是依循上述三種類型有不同程度的發展。

中共與第一種類型的國家羅馬尼亞和南斯拉夫之間的關係良好。羅馬自一九四九年十月五日承認中共政權以來，雙方關係的發展是最平穩的。南斯拉夫亦於同日承認中共，但雙方的關係頗多曲折；至一九五五年中共和南國始正式建交並互派大使，同時建立兩黨關係；一九五八年南共「七大」後，因意識形態分歧而中斷兩黨關係，大使也被召回，僅留臨時代辦；一直到一九六九年之後中（共）南關係才逐漸改善。七十年代以來，中共與羅、南黨政軍和民間團體均有密切的來往。一九七〇年中共與南斯拉夫重新互派大使，一九七七年南國總統狄托（Josip Broz, Tito, 1892-1980）應邀訪問中國大陸，兩黨關係正式恢復。一九七八年當時華國鋒以中共主席兼國務院「總理」之尊，訪問羅、南兩國，並同時簽訂經濟科技長期合作協定，雙方亦成立所謂的中（共）南、中（共）羅經濟科技委員會。⑨一九八三年中共總書記胡耀邦又赴羅、南兩國訪問，是中共實行開放政策之後，第一位最高領導人前往歐洲訪問，可見，羅、南這兩個東歐共黨國家在中共心目中的份量。

南斯拉夫修正主義在五十年代末期曾受批判的對象。到六十年代初，中共更假藉批判修正主義，指桑罵槐，向蘇共展開理論鬭爭。一九六九年三月中蘇在珍寶島邊界發生流血衝突後，中共與南國的關係始出現轉機。一九七五年南斯拉夫聯邦執行委員會主席（即政府首長）比耶迪奇（D. Brijedić）首途赴大陸訪問，二年後（一九七七年）南國總統狄托亦應邀訪問北平，中共與南斯拉夫終於拋棄十餘年來馬列主義之爭，雙方重新修好。一九八〇年狄托去世時，中共還慎重其事地，由華國鋒率領黨政代表團前往南斯拉夫參加狄托的葬禮。⑩由此以觀，毛澤東死後和「四人幫」垮臺，中共對外政策起了很大的變化。「意識形態」這玩藝兒不再是中共掌權的萬靈丹，非堅信到底不可。中共已比較懂得，「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最好方法」。

註⑨ 世界知識年鑑，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一九八二年，頁五〇五—五一一。

註⑩ 同註⑨。

羅馬尼亞自六十年代以來對外政策相當強調平等、尊重獨立主權、不干涉內政、互利、不訴諸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脅等原則。⑩這些主張頗得中共歡心，因此，北平視布加勒斯特(Bukarest)為知己之交。當中蘇共交惡期間，羅馬國不偏不倚，保持中立，沒有像其他東歐國家——波蘭、東德、捷克、保加利亞、匈牙利等國，和莫斯科採取一致的立場，經常在報刊上登載反中共的言論。二十多年來，中共與羅馬尼亞雙方合作的領域，亦最為突出，諸如政治、經濟、科技、文化、體育、衛生、新聞以及旅遊等方面，均簽訂有交流合作的協定。七十年代以來，羅馬總統希奧塞斯庫已五度（一九七一、一九七八、一九八二、一九八五、一九八六）訪問大陸，這是其他東歐國家元首不易做到的。⑪

中共與第二類型的國家，如波蘭、東德、捷克、保加利亞和匈牙利等國之間的關係，自六十年代中蘇共展開理論鬭爭以來，中共與這些國家的政治關係即告停頓，僅維持最起碼的經貿和文化的來往。五十年代中共與這些國家均簽訂有經濟、科技、文化等合作交流協定，並且還有所謂的中（共）德（東德）友好合作條約（一九五五年），中（共）捷友好合作條約（一九五七年）和中（共）匈友好合作互助條約等。這十年當中，中共在國際上面臨孤立困境，只能與東歐有較密切的往來。惟六十年代中蘇共交惡以後，這些國家聽從莫斯科的指使，首先黨與黨的關係中斷，隨即各方面合作與交流大幅度減少，一直到七十年代後期，雙方的關係始有緩慢的進展。

中共與東歐這五個國家有顯著的改善，則始於一九八三年，是中共大力推展門戶開放政策之際，雙邊恢復了藝術、體育、新聞、旅遊等方面的交流，到部長級的官員開始互訪，雙方的外交部長也藉著聯大會談在紐約會晤，隨即提升副總理級的互訪，並進行磋商進一步經貿與科技的合作。一九八四年，中共「國務委員」兼對外貿易部「部長」陳慕華先後訪問這五個國家，簽訂了「經濟、技術合作協定」和「關於經濟、貿易和科技合作委員會議定書」。一九八五年五月，中共「副總理」李鵬訪問波蘭、東德、匈牙利三國，正式簽訂五年（一九八六—一九九〇年）長期貿易協定。⑫六個月之後，又與捷克和保加利亞完成同樣的貿易協定。⑬根據資料顯示，未來五年中共與「經互會」成員的貿易額可達到三百二十六億美元，其中蘇聯佔一半以上，計有一百六十三億八千萬美元、羅馬尼亞六十五億美元、波蘭三十億美元、東德和捷克各二十一億美元、匈牙利二十億美元、保加利亞四億六千八百萬美元。⑭由這個貿易數字看來，約相當於八十年代初期，中共與歐洲經濟共同體的貿易總額。根據中共官方的資料，

註⑩ 同註⑨。

註⑪ 同註⑨。

註⑫ 大公報（香港），一九八五年五月十五日，第二版。

註⑬ 大公報，一九八五年十二月十七日，第二版。

註⑭ 大公報，一九八五年十二月二十四日，第二版。

東歐已成爲其紡織品出口的第二大市場。⑩顯然地，中共正試圖分散外貿市場，以平衡其對日本和美國經貿上的依賴。

中共對匈牙利和波蘭似乎特懷好感，匈、波兩國副總理級的政府官員，一九八四年十二月和一九八五年三月，率先其他國家前往中國大陸訪問。中共尤對匈牙利新經濟體制特感興趣，一方面派考察團赴匈作長時間的觀察；另一方面，又禮聘匈牙利經濟改革的策劃者涅爾遜（R. Myers，現任匈牙利科學院經濟研究所顧問）於一九八三年十月二十四日至十一月二十四日率領一批經濟學家前往中國大陸講學。⑪這種禮遇僅見於五十年代，中共向蘇聯一面倒之時。而中共與波蘭的關係，基本上互不對立，雙方還成立有中（共）波航運公司，總公司設在上海，分公司設在格丁尼亞（Gdynia），並在上海和格但斯克（Gdańsk）互設總領事館。⑫匈、波兩國人民均有反蘇的不良紀錄，其對非「經互會」成員加強外貿關係的意願亦最爲積極。一九八五年，匈、波兩國召開共黨大會時，中共曾致電申賀。這是二十多年來所僅見，而開啓了恢復實際關係的先聲。

至於中共和阿爾巴尼亞之間的關係，自一九七六年交惡之後，經過七年的寒暑已有解凍的跡象。一九八三年北平與地拉那已恢復貿易關係，雙邊外貿部副部長已進行互訪。阿爾巴尼亞這個歐洲最落後最貧窮的國家，於六十年代初與蘇聯翻臉之後，曾獲得中共大力的支援。根據中共官方的資料，從一九五四至一九七八年，二十四年間阿爾巴尼亞取得中共一百多個經濟、軍事項目的援助建設，北平耗費了五十億美元以上的資金，並先後派遣六千餘名工程技術人員在阿國工作⑬。惟中共與阿爾巴尼亞的「蜜月之旅」到了毛澤東去世和「四人幫」遭受整肅之後，即告停擺。一九七六年十一月阿共「七大」首先發難，公開抨擊中共內外政策的不當，迫使中共於一九七八年七月七日照會阿國政府中止一切軍經援助，並召回援阿工程技術人員。同年九月，地拉那不甘示弱，宣佈廢除中（共）阿輪船股份公司的協定，並解散該輪船公司，中斷雙邊貿易、科技和文化合作⑭。不過，統治阿國達四十年的史達林主義強硬份子霍查（Enver Hoxha, 1908-1985）已於一九八五年四月十一日謝世，由新人阿利亞（Ramiz Alia）接掌政權。這一年來種種跡象顯示，阿國也謀圖改弦更張，實行開放政策，以解決其日益艱困的經濟危機⑮。因此，改善雙邊關係，正符合共同願望。一九八五年十二月阿國外貿部副部長阿亞茲抵達北平，正式和中共簽訂一九八六—一九九〇年換貨和付

註⑩ 同註⑤。

註⑪ 世界經濟月刊（北京），一九八三年十二月，頁二八。

註⑫ 世界知識年鑑，同前揭書，頁四四八。

註⑬ 同註⑬，頁四二〇。

註⑭ 洪茂雄，「阿爾巴尼亞何去何從」，問題與研究，第二十四卷第八期，民國七十四年五月，頁三一—四〇頁。

註⑮ 同註⑮。

款協定<sup>②</sup>。中（共）阿之間顯然又有了進一步的發展，但要回到過去的「親密戰友」階段，似乎不太可能出現。

#### 四、趙紫陽東歐之行的意圖

在去（一九八六）年秋天，當波蘭和東德共黨領導人訪問中國大陸之際，中共中央總書記胡耀邦和國務院「總理」趙紫陽均接受邀請，定期作官方的回訪。隨後，即傳出趙紫陽準備在今年六月訪問東歐，而胡耀邦則準備在中共「十三大」召開之後前往。可是沒想到去年年底，中國大陸却掀起一陣學生示威運動，要求自由與民主，使得胡耀邦就在中共「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風浪中下臺，其總書記的職務由趙某暫時代理。因此，這次趙紫陽東歐五國之行，乃以代理總書記和國務院「總理」之尊進行訪問，使這次東歐之行更具份量。

趙紫陽此次東歐之行，標榜著「增進瞭解、加深信任、促進合作、維護和平」<sup>③</sup>。這是相當冠冕堂皇的宣傳！其實，要瞭解趙紫陽東歐之行的意圖並不難，只要掌握下列三個層面，即可洞察全貌。

首先，就政治層面而言，趙紫陽這次東歐之行，幾乎每到一個國家都特別強調二項基本理念：其一，就是所謂的「獨立自主、完全平等、互相尊重、不干涉內部事務、和平共處五原則」；其二，要交換所謂的「社會主義建設」經驗。趙紫陽於這次行程中，在記者招待會上頻頻提及中共的改革與開放政策，並且透露中共的「十三大」還要進一步提出政治改革的方案<sup>④</sup>。趙某似乎頗用心機，試圖以中共的「改革」和「開放」，與蘇共的「改造」（perestroika）和「公開」（glasnost）互別苗頭。很巧的是，這些調劑也是蘇共總書記戈巴契夫最近一年來在東歐訪問時所一再提出的。趙某這種姿態，不免予人有「中共也想在東歐分一杯羹」的感覺。

其次，就經濟層面而言，中共這八年來搞「改革」和「開放」，使其經濟發展稍有起色。惟中共資本短缺，科技水平仍嫌落後，過去一段時間和西歐國家的經貿關係與科技合作頗有所獲。為此，中共當局爲了平衡與東西歐的關係，與同招牌的東歐「社會主義國家」加強關係，乃有其客觀的需要，藉此一方面分散市場，另一方面從東歐取得較廉價的科技。此次趙某訪問東歐，即和這些國家簽有「關於至公元二〇〇〇年經濟和科技合作基本方向的協定」<sup>⑤</sup>。顯然地，彼此間已擴大了經濟合作的領域。不過

註<sup>②</sup> 大公報，一九八五年十二月四日，第三版。

註<sup>③</sup> 大公報，一九八七年六月四日，第一版。

註<sup>④</sup> 大公報，一九八七年六月十四日，第一版。

註<sup>⑤</sup> 大公報，一九八七年六月十八日，第一版。

，東歐國家自己有其經濟困境，加上外債負擔沉重（波蘭三百五十億、東德一百二十三億、匈牙利九十億、捷克三十五億、保加利亞二十五億美元）<sup>②</sup>，對中共的幫助畢竟有限，遠不如西歐的「資本主義國家」。爲此之故，中共「走資」路線仍將陰魂不散，阻擋不了。

再其次，就戰略層面而言，中共自己心裏有數，明知其在歐洲的活動空間有限，很難取得戰略利益。因此，最近二年來，北平領導當局相當強調東西歐的合作，鼓吹東西歐放棄意識形態的分歧，加強對話，不要讓美蘇兩霸爲所欲爲。趙紫陽這次東歐之行，可能懷有二個意圖：其一，轉達中共對美蘇減裁中程核武器問題的關切；中共已宣稱不首先使用核武器，深獲東歐國家的支持，但對蘇聯在亞洲部署中程核武導彈仍感不安；其二，中蘇共關係正常化的三大障礙，其中以越南入侵柬埔寨是最大障礙；趙紫陽此行似乎有意敦促東歐共黨領導人正視此項問題，期對莫斯科和河內施加壓力。趙某此次東歐之行，沒有接受克宮的邀請，於返國途中在莫斯科作短暫的停留，而選擇在巴基斯丹。這顯示，中共與蘇聯的關係尚無實質的進展<sup>③</sup>。然而，由於東歐國家自主性的程度提升，中共與東歐國家關係正常化之後，東歐或許對中共多少還有一點戰略價值。

趙紫陽東歐五國的行程，分別是波蘭五天，匈牙利四天，捷克、保加利亞各三天。如就其訪問過程的安排，不難發現，趙某獨鍾匈牙利，對匈國特懷好感。根據中共報刊有關趙某此行的種種，以在匈牙利的報導最突出。一般都知道，六十年代匈牙利採取漸進的改革措施已收到某種程度的績效，西方輿論界對匈牙利的改革與開放政策也頗多讚賞，甚至戈巴契夫對布達佩斯的作爲，亦另眼看待，引爲借鏡。

基本上，中共搞改革和開放，是師法匈牙利的。趙紫陽此行就毫不諱言的說，他來匈牙利就是想要多學習一些經驗<sup>④</sup>。香港左派報紙大公報就刊載「中新社」一篇特稿——「『總理』請教總經理」，文中指出，趙紫陽參觀匈牙利著名的「拉賓」車廠。趙某以統治十億人口的「總理」移樽就教管理一萬名職工的總經理。趙紫陽在該車廠提出的問題特別多，舉凡基金籌募、生產與浪費價格、利潤、工資增長幅度、工廠管理結構、外匯等等<sup>⑤</sup>。據稱，這家工廠將爲中共訓練三百五十名技工，該廠已和中共簽有合作契約，中共是其主顧，購買拖拉機、重型卡車、農機等車輛和機械。<sup>⑥</sup>

註② *Der Fischer Weltatmanach, 1987* (Frankfurt: Fischer Taschenbuch Verlag, 1986) p. 289, p. 438.

註③ 大公報，一九八七年六月十九日，第二版。

註④ 大公報，一九八七年六月十七日，第二版。

註⑤ 大公報，一九八七年六月十九日，第二版。

註⑥ 同註⑤。



儘管匈牙利實施了二十年的改革與開放政策，却仍然面臨經濟困境。一九八六年匈國的經濟成長指標並未實現<sup>⑩</sup>。目前，圍繞在匈共領導階層的難題是，改革應該推展到什麼樣的程度？如何克服外債的負擔？以及提高對外貿易的競爭力？匈牙利爲了解決這種難題，已於六月二十五日宣佈內閣改組，這正可證明，「社會主義優越性」畢竟是極其有限，連推動改革與開放足足有二十年歷史的匈牙利，都難克服層出不窮的內在危機，更遑論中國大陸了。

## 五、結 論

以上說明了中共與東歐國家建交以來發展關係之過程，以及最近改善關係之狀況。綜觀中共與東歐國家關係發展的特徵，可納歸下列幾點：

第一，蘇聯是中共與東歐國家（羅馬尼亞、南斯拉夫例外）改善關係的主要變數：中共與東歐國家的關係正常化，這條漫長的道路，仍須通過莫斯科始能暢通。一九八六年七月蘇共總書記戈巴契夫在海參崴的演說中曾特別宣稱，隨時隨地準備與中共改善關係。其後，波蘭和東德共黨頭目始採取行動，前往中國大陸訪問。最明顯的例證，最近訪問中共的四位東歐共黨領導人在他們返國途中，幾乎都在莫斯科作短暫的停留，向其克宮主人作簡報。

第二，改善關係採漸進方式，遞升接觸的層次：中共與東歐國家互訪的政府官員職別，由中階級而副部長、部長、而副總理，最後再提升到總理和共黨最高領導人級。合作交流領域由藝術、文化、體育、新聞而擴大到經濟、科技，以至黨際關係的恢復。

第三，一九八三年是中共與東歐國家關係的重要轉捩點：這一年中共與東歐國家取得協議，雙方外長同意每年可在聯大舉行會議時，在紐約會晤，彼此交換有關國際局勢和改善雙邊關係之意見。

第四，配合中共實施經濟改革與開放政策：中共在推動經濟體制改革時，相當強調東歐國家的改革經驗，試圖吸取一些實際經驗，再配合本身特殊環境，以完善所謂的「中國式的社會主義體制」。

第五，中共與東歐國家之關係象徵性的意義大於實質性的意義：中共儘管標榜全方位的外交政策，強調發展對東西南北之關係，實際上，中共着重「經濟掛帥」，亟需資金和技術。中共發展對外關係不可能全方位平衡進行，到底第三世界和共產世界，也需要那些所謂「資本主義國家」的鈔票和先進的工業技術。因此，當前中共仍須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助一臂之力。東歐國家正面

註⑩ 同註⑨，頁四九六。

airiti

臨經濟難題，自身難保，對中共的需要「心有餘而力不足」。最近中共一位負責外貿的高級官員就很抱怨的表示，東歐國家的交貨日期經常拖延，並且品質也不如西方<sup>②</sup>。由此可見，儘管中共與東歐共黨國家的關係有了突破性的發展，但這種關係頂多只具備了象徵性的意義。

總而言之，中共與東歐國家發展關係有其客觀的因素，在雙方關係正常化之現況下，其未來的發展或影響大致會有下列幾種可能：

(一) 東歐仍然是蘇聯的勢力範圍，中共想要分化東歐國家與蘇聯的親密關係，機會不大。

(二) 歐洲維持一個和平而穩定的局面，對中共發展與東歐國家的關係有利。

(三) 中共與東歐國家關係正常化，有助於中蘇共關係之改善。惟中共與東歐之關係，經濟層面將大於政治層面，正如中蘇共關係一樣。

(本文作者現為本中心研究員兼國際共黨組副召集人)

註② 大公報，一九八七年六月六日，第二版。

\*

\*

\*

\*

\*